

目 录

- 一、于渊烈士生平事略……………蔡清宴（ 1 ）
- 二、射洪复兴区农民的抗旱斗争纪实
……………汪 朝口述 胡治国整理（ 13 ）
- 三、太和镇农民的抗旱斗争
……………万蒸翹 张友渔（ 17 ）
- 四、射洪县广兴乡“汉奸案”内幕
……………吴汝成 舒 型（ 20 ）
- 五、痛惩马团正的情况纪实
……………罗奇兆（ 25 ）
- 六、抗击蒋帮一小撮空军人员行凶纪实
……………蒋子卿（ 28 ）
- 七、前堵后追与英勇反击
……………郭怀冰（ 31 ）
- 八、忆“徐州突围”战
……………杨善培（ 35 ）
- 九、记国民党溃军孙元良部在射洪县的部份罪行
……………罗奇兆（ 38 ）
- 十、射洪倡修“九坝水利”始末的回忆
……………吴汝成（ 41 ）
- 十一、青岗坝开旱河轶事
……………彭子模（ 45 ）

十二、私立盐区建业高级职业学校创办过程	
.....	青元方（48）
十三、浒溪中学创办始末	
.....	李本生（50）
十四、解放前射洪县各类税捐殃民实录	
.....	张友渔 马伯敷（53）
十五、太和镇的典当、钱庄、银行业	
.....	马伯敷 杨久安（68）
十六、太和镇“福源商号”的经营概述	
.....	吴映先（72）
十七、税狠人的故事	
.....	马临皋（77）
十八、柳树乡饶益寺轶闻散记	
.....	罗奇兆（81）
十九、我在台湾生活的日子	
.....	张月娇（82）

于渊烈士生平事略

蔡 清 宴

于渊烈士、名光藻、号邦齐，四川省射洪县金华区龙宝公社于家坝人。生于一八九三年，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七日二十四时就义于成都西门外十二桥。遗体与当时三十二同难烈士葬于成都青羊宫二仙庵侧烈士公墓。一九五〇年一月，烈士亲属从成都载回烈士血衣冠，衣冠墓安葬于县内名胜——金华山右侧。

烈士故居于家坝，距旧县城（金华镇）约十五华里，当地土质肥沃，早为县内棉花主要产地。而烈士家却无立锥之地，完全靠租佃他人土地耕种。祖父于治明，祖母黄氏，父发祥，母何氏，生子三人，烈士居长，二弟光宗字焕廷，三弟光荫字定华。父早丧。何老夫人抚育兄弟成长，历尽辛劳。据传每到冬季，必离家七华里的牯牛寺坝拾芭茅格篾，人说整坝芭茅她都摸遍过，其辛勤有如此。烈士童年仅读私塾一年，居家与母分劳。壮年与双溪乡胥姓女结婚，生子民权。烈士身高力壮，性情直率，富反抗精神，农闲于涪江边拉短纤船，或给人家做短工，倘遇船主扣减短纤工资，烈士总是带头力争，直至胜利方止。一九一四年某月烈士从金华镇挑粪回家，粪水偶溅某豪绅衣裤，该绅恃强，初则辱骂，继而动拳，烈士忍无可忍，愤然反击。在昏暗的旧社会中，

• 1 •

烈士被迫离家，奔至邻县三台，无亲可投，便毅然置身行伍，一生成马生涯便从此开始。后来与卢孟君夫人结婚，生子民望，女民勤。

于渊烈士入伍之日，乃军阀割据之时。初入川军杨森部，后投川军刘湘部。斯时国内阶级矛盾，民族矛盾日趋激化，中国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，时代激荡的现实，激起了烈士思想上的波澜。二十年代，为烈士政治上的启蒙时期，也是逐步进入成熟的阶段。由于烈士在旧军队中，既无瓜葛亲，又无师友谊，凭勤学苦练，身先战阵，骁勇无畏，谋略过人，从一名小兵开始，随即由班、排、连、营而升团长。一九二六年，烈士在杨森部任团长兼万县宪兵司令，共产党员朱德同志到万县杨森军部，在朱德同志留居部队，两个月时间，烈士受到深刻启示，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境界，并在光辉的一生中，不断谱写壮丽的诗篇。同年国共合作，从广州开始的伟大的北伐战争，威胁着帝国主义列强的在华利益，英帝国主义者利用《天津条约》取得的内河航行权，它的船只在长江各埠横冲直闯，无视我国主权，不断制造事端，震惊中外的“万县惨案”，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爆发了。

万县地处长江上游，川东重镇，是时为川军二十军杨森军部所在地。于渊担任该市城防保安责任。八月二十九日，英国太古公司“万流”号货轮由湖北宜昌上驶，行至云阳江中招致漂船，接送行客，于渊部宪兵连长孙恒解送盐款，带领该连士兵，拟搭乘该轮返回万县，雇用木船三支，送士兵和盐款上“万流”轮，不料该轮刚将乘客送离，便加足马力，打起快航，靠近“万流”轮上的三支木船，突被骤起的汹涌波

涛打翻，四十六名士兵，五十六条枪支，九千六百万元的盐款，全部沉没江底。于司令接得报告，气愤填膺，全团将士也异常震怒，请示杨森要求严惩肇事英轮。靠军事投机起家的杨森，本怕帝国主义，但在群情愤激，众怒难犯的情况下，只得命令于渊便宜从事，意即不要把事情顶真，看风使舵，在这严重的局势面前，杨森并不加派兵力，坐观势态的变化。烈士素性刚烈，威武不屈，立即下令肇事英轮“万流”号停泊待命。殊该轮横不听令，开动轮机竟向下流逃驶。第二天，英国太古公司又一艘“万通”号轮船开到万县，于司令即下令扣留，派遣兵士上轮监视，勒令赔偿这次事件的损失。

被称“东亚病夫”的中国，帝国主义根本就未放在眼里，英帝命令它们停泊在万县陈家沱的“科尔捷夫”号军舰卸下炮衣，会同下游开来的一艘军舰驶抵万县，停泊江心，妄图武力威吓，劫走“万通”轮。九月五日这天中午，于司令接到报告，直上一支商船视察，目睹英军舰逼近“万通”轮时，打死我在船上监视的守兵二人，强逼我军离船，于司令见此情景，便激励左右将士投入战斗，自己脱掉上装，腰紧皮带，手持短枪、大刀、跃入江中，直向英军舰猛冲过去，下令士兵投入战斗。我方北岸山头又连续发炮，封锁英军舰前进水路，激烈的战斗展开了，打得英军舰昏头转向，无法靠拢“万通”。于渊素为川军中骁勇善战的猛将，又兼谋略过人，当此激烈战斗的紧急时刻，他分兵三百组成敢死队，誓要彻底惩罚英顽，扑灭他们的嚣张气焰，便命令敢死队分乘木船，船头放置沙包作掩体，伏倒船中，顺流而下，

靠近英军舰时便一齐开枪射击，这一绝招，使英军舰上远射程炮火顿时失掉效力，只有束手就范，被动挨打，霎时一艘军舰尾部中弹起火，浓烟滚滚，弥漫江中；另一艘军舰，凭籍舰舷高出水面，就临舰边密集布防，妄图阻止我敢死队攀援。于司令身材魁梧，膂力过人，入伍时早就练就过硬本领，纵身跃上敌舰，打开缺口，三百名敢死队奋勇登上，即时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近战，枪击刀劈，英军血肉横飞。英舰付舰长一人，英军十数人毙命，余者纷纷投河，葬身江流，战斗正酣，于司令这时也身中数弹，身旁一连长，上前拉着急呼：“团长，你受伤了！”于司令一掌掀开，大声吼斥“甚么叫受伤！给我冲！”雄狮怒吼，气吞山河。将士奋勇冲杀，中弹英舰急向下游逃逸。不幸突然一弹从于司令左太阳穴穿入，直插耳际而出，伤及要害，立时倒下，士兵奋勇抢救上岸，部队无人指挥，停止攻击，撤回原防。帝国主义本豺狼成性，军事上的失败，使他恼羞成怒，于是便把它的毒焰倒向无抵抗力的万县市民，乘我军停止攻击之际，猛然发起炮来，指向万县城内杨家街，南津街一带，打死打伤我和平居民五千余人，南津街几化为灰烬。军阀杨森早畏帝国主义如虎，不敢据理力争，反请驻万县法国领事出面调停。人民的生命财产，竟作了他们宁事媚外的牺牲礼品。于司令住万县法国天主教会办的医院中，当昏迷之际，仍不时高呼：

“给我狠狠地打！”对保卫祖国，仇恨帝国主义的爱国情怀是何等坚决！实不愧民国以来，四川军队中首屈一指的爱国英雄。“万县惨案”说明了中国人民是不可侮的，帝国主义只不过是只纸老虎，它的肆虐更充分暴露了它的虚弱。杨森

之类的军阀，是屠杀人民的刽子手，又充当了帝国主义的忠实奴才，永为万县人民唾弃的败类。

一九二八年，二十四军刘文辉部第一师付师长张致和驻防江津，张当时是中共地下党员。该师师长刘文辉兼，张付师长负实际责任。师内地下党员多属军内中、下级干部，在当时上级党组织指示下，要张致和领导士兵起义，由于张部署不周，行动过左，在师内杀了刘文辉的亲信干将数名，刘坚持清理镇压，使党的力量遭到巨大损失。中共四川省委特派烈士同另一同志前往视察，办理善后，烈士肩负重任，不怕危险，在万分险恶的环境中，保护了一些同志的安全。一九三〇年烈士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“万县惨案”后，杨森感到于渊在他军中是一个潜在的威胁，当伤愈不久，便借故解除了军职。一九三三年，于渊同志到刘湘部队，在四川有名的二刘之战（刘湘、刘文辉）中，刘湘采纳于渊同志的建议，由内江裨木镇突袭，打破刘文辉的作战计划，取得了战争的全局胜利，统一了四川。刘湘主持川政，便委任于渊同志为成都四川省会警察局长。他以警察局长的合法身份作掩护，使警察局机关成为党的秘密活动场所，林蒙、肖华清、胡芷卿等地下党同志均在局里供职。并以确保成都市社会治安为由，请刘湘拨步枪三百支，将成都警察分编为三个区队，于志澄、黄宗耀等同志分任一、二、三区队长，把成都公安武装牢牢地掌握在党的手里。一时警察局内济济多才，不少革命青年也成为局长的常客，大大展开了党在成都的地下活动，锻炼了一批党的骨干。同僚廖仲涛向刘湘密报，认定于渊是共产党，耽心成都搞起武

装暴动，难于对付。仇视共产党，是一般军阀们的本性决定了的，所以时间不到一年，于渊的警察局长便被解职，仍回军队，任二十一军刘湘部的教导师二旅旅长。

一九三三年，中央红军从江西突围，北上抗日，四川军阀奉命堵截，国民党军队尾随红军，妄图将红军主力一举消灭于川甘边境。于渊同志当以旅长兼任刘湘部前敌指挥官，担任天全、芦山、宝兴一带辖区防务。该区地势险峻，又为红军必经之路，朱德同志率领红军前来，探知烈士指挥军务，派人送密信要求让道，于渊同志毫不犹豫，即命令部队转移防地，让出豁口，红军得以顺利通过，为北上阿坝创造了有利条件。数月之后，红四方面军从川北开赴毛儿盖与红一方面军会合，于渊所部复奉命开赴川北防堵，防线中有一个两山夹一沟的观音梁子，形势非常险峻，川军派重兵驻扎。于渊同志接得密报，红四方面军在数小时之后，便要从此地经过，重新布署防务来不及，通知红军缓进或改道也不成，在这千钧一发之际。于渊同志不顾个人安危，假托一个情况，即以指挥官身份毅然将部队调离十五华里之外，促成红军在毛儿盖会师，毛主席、朱总司令在长征途中得以从容布署进军计划。由于一次、二次的所谓指挥“失误”，自然引起川军中将领们的情绪沸腾，要求刘湘惩办，刘湘与烈士虽有私谊，这时也难庇护，便以贻误军机，撤职论处，在撤职的通令中有，“进不遵命，退亦忽然”之句。不久，即以绥靖公署少将参议衔，促其东渡日本考察。

于渊同志治军严谨，无论在驻扎防地或战争当中，都心怀群众，对人民秋毫无犯。迄今本县太和镇父老对烈士当年

率军驻扎太和镇数月的军队纪律，尤极口称赞。烈士属一员猛将，而勤学习，爱文化、驻节重庆、成都、湖北沙市等处，恭礼文人士，读书、学字，孜孜不倦。县中清末举人马天衢老先生，就是他文学上的师友。一般革命人士，进步青年，经常住留他的公寓，探索革命理论，分析斗争形势。他生活俭朴，作风正派，在当时的川军将领中实属罕见。

一九三六年初，于渊同志东渡日本，途经上海，上海文化界人士田汉，夏衍以“民族英雄于渊氏抵上海，下榻励志社”作标题，用二号字在申报头版上登出，表示热烈欢迎。在上海期间，拜会了鲁迅先生，并同鲁迅先生合影沪上。到达东京后，郭沫若同志为首的中国留日学生组织“春柳社”，有三十八名社员，以每人两毫银角的股份，于东京“银庄”为烈士洗尘。会上，烈士发言，辞意谦恭，要求留学同胞为他在日本期间开拓视野，输送新知。会后沫若同志谈及，他在日本正从事甲骨文研究，希望能在经济上予以支援，烈士回国到达北平，（今北京）即寄去四百元银元资助。

西安事变后，国内抗日高潮风起云涌，烈士在党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指引下，出钱主持开展党领导下的救亡运动，与甘树人、胡芷卿、徐庆坚、郭祖洁等同志于成都创办“力文”周刊，唤起民众、宣传抗日，反对独裁。发行七期，遭国民党反动派嫉恨，被迫停刊。由于期刊抒发了人民的爱国意志，在抗日的民族救亡洪流中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。

一九三七年抗日军兴，刘湘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，于渊同志经委为师长兼第七战区游击司令，辗转两湖江淮间，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。逾年刘湘病故，杨森以付司令长官代行

职务，烈士与王陵基意见不合奋而回川，于战时陪都——重庆任中央训练团付大队长，教育长陈诚邀烈士参加国民党CC系，烈士谢绝，离职返蓉。卖去在天回镇的田地，择成都北门外，靠近簸箕下街的乡间建房居住，日则读书写字，育瓜种菜，接交田户菜农，躬耕于园中大约半亩的土地之上。蒋介石对烈士闲居成都，心怀戒惧，一九四二年即派待从武官俞济时来蓉，捧军委中将参议衔，邀烈士到重庆供职，妄图以官禄为诱饵，将烈士羁縻身边，烈士早洞悉蒋介石反人民本性，岂能违心投靠，遂毅然推拒。

一九四三年，旅蓉大、中学生，鉴于射洪县同乡会领导不负责任，组织瘫痪，建议登记在蓉同乡，召开同乡会，改选理事会。于渊同志众望所归，一致推戴为理事会理事长。在于渊同志任职期中，培建同乡会会址，让来蓉谋生的贫苦同乡享受免费住宿；买坟地，施棺木，使无告的同乡客死成都者，不致裸露尸骸。旧中国农村凋敝，一遇荒年，射洪山区地方的同乡常有来蓉谋生者，烈士多为之介绍临时工作，度过困难。鼓励青年求学。排除同乡中家庭邻居的疑难纠纷，不倦不厌，基于级阶本能，不论在官在民，念念不忘劳动大众的急难与痛苦。距旧县城金华镇十五华里的武东乡马家沟，盐井林立，每天近百名脚夫挑盐入城，必须翻越陡峻的将军背山梁。炎夏季节，时有因累中暑现象。一九四三年烈士回家，与射洪盐场评议公所议长赵师礪商议，为改善劳动者运输条件，便在武东乡小学邀请灶商陈怀伦、陈怀瑜、张仲常等集议，筹建射盐公路（射洪县至盐亭）金华镇至马家沟段，烈士被选为董事长，亲身勘测路基，筹集经费，招商承包，

参与设计施工，半年路成，为射洪县解放前首建的一条乡村公路。交通促进了农业发展，交易繁荣，行旅称便，翌年于马家沟建武东场，更加方便群众，至今尤为县人称道。

早在一九四二年，烈士拒绝蒋介石以官禄笼络之后，经民盟张澜主席介绍，为反对独裁，实现民主，加入中国民主同盟，旋被选为民盟四川省支部执委，烈士入盟后，模范遵守盟的章程，积极开展盟的活动，对盟内有知识，有修养，有经验的如杨伯恺、马哲民、李相符等老同志，备加推崇，经常接触，磨砺熏陶，晚年已成为具有高度政治素养的民主战士了。一九四五年回乡省亲，携带大批盟内文件、刊物、表册，于旧县城——金华镇发展了杨行健、罗英武、蔡清宴等同志为盟员，射洪县之有民盟组织，从兹伊始。

一九四六年夏，国民党反动派在昆明，制造了血腥的“李闻事件”这一惊人惨案，震撼全国。在民盟四川省支部于同年八月二十九日假成都蓉光电影院，召开纪念李、闻二烈士死难追悼会。当日约千余群众，满怀激愤心情来参加大会，挽联挂满影场内外。于烈士送挽联两付，一付系私人敬挽，一付是用射洪县同乡会名义，本属极其平常的事，国民党反动派竟借此节外生枝，有意刁难，旧历年底，射洪县旅蓉同乡会集会于成都市商会，便支使同乡中个别特务份子，国民党的党、团骨干，在会上提出质询：“理事长为什么不经过理事会，便以同乡会名义送挽联追悼李、闻？这是超越职权，务须登报收回。”这种非理的责难，烈士即时慨然答复：“李公仆、闻一多当今文人，海内知名学者，射洪县同乡会送挽联追悼，是我们的光荣，我理事长这样处理是应该

的。这点事用不着开理事会，也等不及开理事会。”“在场的广大群众不断发出呼声：“理事长有权！同乡会送挽联是应该的。”极少数特务分子和国民党的党团骨干，仍坚持认为不合法，顽固地要求登报收回，争闹不休，有人提出折衷办法，交大会表决。如通过追认，此事不提；如果否认，就由理事会登报申明挽联无效。当通过追认时，伴随呼声的拳头，象森林般矗立会场；表决否认时，则寥寥几支瑟缩的手，慢吞吞地举起来。又羞答答地缩了回去，反动派的爪牙走卒，却表演出来了一场自搬石头砸脚的蠢事。

一九四七年，蒋介石已彻底揭下和平假面具，悍然发动反人民的内战，广大人民群众重新陷入痛苦的深渊。是年冬、春二季连续干旱，人民生活濒临绝境。在成都的官僚资本主义，既在抗日战争中发了横财，这时又想大捞一把，收买四面粮食，囤积起来，让米价一日数涨，广大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，贪婪无厌的吸血鬼们无动于衷，烈士住家周围一带市民和附近乡农，嗷嗷待哺，日食难度，而北门外四川省银行仓库的黄谷，囤积如山，就是颗粒不卖，等待涨价。于烈士几年前因群众推戴，搞了个哥老会，名“复华社”，他任社长，该社弟兄，不少住家北门街道和农村，于烈士目睹此种情景，既不能忍受，也不能等待，便在四、五月间致函该社管事，组织群众购买，殊知银行仍颗粒不售，顿时激怒了广大贫苦群众，一场轰轰烈烈的反饥饿斗争开始了。群众奋不顾身，与前来镇压的军警进行搏斗，受烈士平素信赖的两人被抓去，风浪所及，几天后，在成都的抢米风潮此起彼伏，同年南京、上海、武汉等地，相继发生同类事件，大大

震撼蒋家王朝大后方的基石。国民党反动派对于烈士大为不满，在蓉的民盟同志为了烈士的安全，婉言劝其离开蓉垣，烈士从容回答：“粮食是老百姓生产的，他们夺去囤积赚钱，看着老百姓饥饿不管。人不能站着饿死吗！买不到才抢，是合情合理的，他们会把我怎么样？我怕什么。”反动军警慑于烈士威望，也未敢贸然下手。

一九四七年六月一日，国民党反动派将反人民的战争进行到底的凶象毕露，在国统区的各大城市，对地下党员，民主党派，民主人士，进步青年进行一次大逮捕。成都中共省委许寿贞、民盟在省负责人杨伯恺，田一平及百余爱国志士、革命青年，在一夜之间，大多被逮捕入狱。烈士大名早列入黑名单，自然不得幸免。六月一日午夜，于烈士宅外有人呼叫：“请于师长到青龙乡（住处属该乡）公所开会，有要事商量。”烈士身着白睡衣，脚曳拖鞋。缓步走到大门，心知有异，仍安详若素，叫跟随的人开了大门，几个象老鼠一样的黑衣军警闯了进来，荷枪实弹，把烈士围在中央，声言严啸虎司令请师长谈话，烈士态度自如，回身叫起卢孟君夫人收拾衣物，便随这批爪牙走出大门，走上公路，进入早经预备好的黑车，从此转移环境，与敌人展开了另一形式的斗争。

卢孟君夫人随烈士戎马半生，经过了多少惊涛骇浪，深悉烈士的品格和情操，是烈士同生死、共患难的革命伴侣。事变非常，心境十分沉痛。在敌人残暴的威胁下，挺身而出，寻究竟，查根源，向统治者提出质问，多方设法营救。从邓侯锡（川康绥靖主任）口中，得知烈士关在成都行辕（清代将军衙门）军统特务控制的监狱里。从严啸虎（成都警备司

令)口中,得知烈士入狱以后,口头上承认一下共产党不对,民主同盟不对都不肯。经卢夫人不懈努力,打通关节,才将年龄还不到十岁的女儿送到监狱,看望了父亲一面,烈士得见亲人也仅此一次。嗣后,夫人全部挑起主持家政,抚育子女的重任,现二子一女均已为人民工作多年,孙儿女,外孙儿女,或工作,或读书,正在党的阳光雨露下茁壮成长。夫人年及八旬,一直受到党的关照,人民的尊敬,现寓居女儿民勤处,欢度晚年。

真金不怕烈火,烈火炼出真金。两年半的铁窗生活,在烈士的生命史上谱写了壮丽的诗篇,正如文天祥之囚北庭,与人间长留浩然正气烈士。入狱,与中共四川地下省委许寿贞(世界语学者)民盟中委杨伯恺及另三位同志关在第一号牢房,室内无他物,只有连板铺。壁上牛肋,可看见外面走道,六位同志利用可贵时光,有如在外面过组织生活那样,互相砥砺,共同提高,对胜利充满信心,个人危难置诸度外。同时被捕的罗启维在重庆曾向笔者谈过这一事实,每当被审讯的同志经过他们窗前,杨、于二老一定要喊着:“老弟,硬扎些,不要丢丑!敌人已到没落的时候了。”简而有力的几句话,象给人打了强心针一般,在敌人审讯考验时,发挥了巨大的精神力量。晚饭后放风半个钟头,杨、于二烈士身边聚集着不少革命青年,听他们讲形势,讲历代忠贞事迹,特务们要驱开也颇费力。对一些骨头软,企图出卖灵魂换得苟安之辈,他们是痛加斥责。一九七四年特赦,现安置在射洪县政协作常委的吴汝成先生讲了这样一段往事:我与于渊谊属同乡,私交较好,我当时任西康调统室主任,因

公回到成都，听说他遭逮捕，就代为各方面奔走，设法营救，去狱中看他说道，我可能为你出狱想些办法。于渊烈士意志坚定，慨然回答我，“现在革命形势，或许你比我更明白些，可以不用商量了。”其革命意志之坚定，实在令人钦佩。解放后，从西南长官公署积案中看到，王陵基（当时四川省主席）拒绝保释于烈士时说：“他骂我们都骂得，我们就关他不得吗？”事实正是这样，不少前来劝降的人，都遭到他的斥责。特务拿着代为写好的悔过书找他签字，被他掀出牢房。从容就义，视死如归。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七日深夜，十二桥三十二烈士临死不屈的崇高气节，为革命，为人民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

一九五〇年一月，中国民主同盟在北京召开一届四中全会，烈士经选为民盟中央委员。（当时民盟中央还不知道烈士已就义）现在，烈士和我们永别三十三年了，但他的光辉形象，高风亮节，如同高耸的巍巍雄峰，永垂千古。

（本文材料系根据县中有关同志回忆，并参考成都市文史资料二辑部份内容。）

射洪复兴区农民的抗旱斗争纪实

汪朝口述 胡治国整理

一九三〇年的射洪，全县分为田（颂尧）李（家钰）两个军阀的防区，木孔垭以上为上半县，属田管辖，木孔垭以

下为下半县，属李管辖，当时上半县的县知事是古之彦，此人是个吸食鸦片烟，贪污成性，残酷剥削人民的里手，他和地方驻军连长方某（名不详）勾结，更以当地团总、保正为爪牙，彼此狼狈为奸，对辖区人民，极尽敲诈勒索之能事。当时复兴区的团总胡祯廷，由于同县知事紧密串通，有恃无恐，遂狐假虎威地利用职权，独霸一方，对复兴区人民进行残酷地压榨和剥削，人民在此重重压迫之下，生活感到极度困难，已有“民不堪命”的痛苦，加上是年天旱，数月无雨，农民哪能经受得起自然灾害的袭击。是年六月，田禾多枯，眼看收成无望，渴望得雨的农民，就只有火烧龙背（山头）诵经求神的方法，迷信神灵保佑，降下时雨之外还用黄荆马桑，扎成水龙，自发地结合拢来，要进县城，要求县大老爷和他们一同求雨，他们以为县大老爷是“民之父母”，能体恤人民，为人民向上天请命，必然能感动上天，降下甘霖，那知当时的县知事古之彦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出衙一看，反而冷笑着说：“哼！黄角树的叶子还是青青的，这算什么天干！”言罢拂袖而入，这时，群众非常愤怒，以当时人数不多，不敢有所作为，于是愤愤离开县衙，回到复兴去了。

古之彦对待请愿农民的那种态度，自然激起了复兴全区农民的无比愤怒。数日后，他们便约全区很多精壮农民，扎成多条水龙进城，在出发前，他们先向团总胡祯廷请愿，要他冒着烈日炎天，打着赤脚，随着水龙队伍，一同进城求雨，胡团总当时迫于农民压力，便无可奈何地随着水龙队伍一路进城。复兴距旧县城（金华镇）三十华里，这天烈日高烧，气候炎热，胡团总赤着双脚，被灼热的石板路烫得红肿，疼痛

难忍，一步一呻吟地走着，农民们的心里，都共同地想在一起，“这下你可想象得到满田禾黍半枯焦的苦况了吧！”

当水龙队伍一齐拥进城的时候，大家激于气愤，齐声高呼“打倒古县令，人民好活命！不准朝后退，只准向前进！”水龙队伍，打从各条街道拥进县府衙门，这时人山人海，如潮水一般从各条街道涌进，农民还将所带的枯苗焦叶，抛向衙中，顿时就堆积成如象一座小小的山丘，要叫县知事出来看看，欲借此来驳倒古之彦所说的“黄角树叶还是青青的，不算天干”的荒谬言论，这时古之彦躲在后衙，不敢出来。

当群众愤怒的时候，有些青壮农民，便跃上县衙大堂，踢翻官案公桌，扔掉笔架签筒，进而将粉壁朱门，明窗净椅，乃至后院中的大桥花盆，以及古之彦所最心疼的一大钵南上鸦片等物，打得粉碎，踏成泥浆。顷刻之间，一座威严赫赫的县府公堂，变成了一个破破烂烂，狼籍满地的荒凉地方。

在此时刻，驻防军官方连长和县警队的巡官，居然出面制止，妄想用武力威胁群众，他们手执三角号旗，摇晃着高声喝道：“你们故意冲撞县府，胆敢暴动抢夺，前来造反，这还了得！如不赶快退出，马上开枪，立地正法，决不放走凶犯！”于是他们一面严令县警冲至四门，将城门紧闭，不让外面群众继续进城；一面指挥士兵，持枪上弹朝天射击，威吓群众。农民们虽然手无寸铁，但人多势大，不惧威胁，闻此喝声，更加愤怒，乃一涌上前，用拳头木棒，和军警拼搏，夺枪拔旗。有个农民，用轿杠将方连长头部打伤，血流满面，形状十分狼狈，这时他才知道众怒难犯，暗自潜逃。